

从江户幕府的翻译事业《厚生新编》(1811—1845) 看日本兰学家的拉丁语学习^①

徐克伟

【内容提要】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借助荷兰语与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兴起了一场名为兰学的学术运动。在以官方翻译事业《厚生新编》为代表的诸多兰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拉丁语的普遍存在。其中既有简单的术语音译,亦有语意层面的学习与诗文翻译。本文以《厚生新编》为线索,探讨兰学家的拉丁语认知及其学习途径,考察他们的拉丁语造诣及其影响。

【关键词】 《厚生新编》 江户兰学 拉丁语学习

A View of Dutch Learners' Latin Studies in Japan from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of *Kōsei shimpēn* (1811—1845)

【Abstract】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there appeared a scholar movement called Rangaku (蘭学, literally Dutch studies or Dutch learning) in Japan, by which Japa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obtain western knowledge directly. I have found another language, Latin, in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of *Kōsei shimpēn* (《厚生新编》, lit. *New Volumes for the Public Welfare*) and some other material of Dutch learning. There are not only many transliterations of terminologies, but also a few lexicons and translated works of this language. As a clue, this paper will make a discussion of Latin terminologies in *Kōsei shimpēn*, and then carry an inquiry into their thinking and routes amongst the translators and related learners. Based on these, I will research the levels and influence of their Latin studies.

【Key Words】 *Kōsei shimpēn* Rangaku Latin Studies

DOI:10.16701/b.cnki.clwl.2016.02.007

一、引言

1774年,一部译自荷兰语的西方解剖学作品《解体新书》刊行于江户,此后日本兴起了一场名为“兰学”的西学运动。1811年,兰学被纳入国家事业,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和兰书籍和解御用”(亦称“蛮/蕃书和解御用”),着手译介一部家用百科全书(*Algemeen Huishoudelijk-, Natuur-, Zedekundig-, en Konst-Woordenboek*, 1778)。此后的三十余年

^① 此前笔者曾于“A Preliminary Study of *Kōsei shimpēn*”(*Journal of Kansai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13, 2015, pp. 139—154)一文中,提出并初步考察日本江户兰学者的拉丁语学习问题(pp. 145—150),拙文即在此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

间,先后有长崎兰通词——荷兰语翻译人员马场贞由(1787—1822)、仙台藩医官大槻玄泽(1757—1827)、津山藩医官宇田川榕庵(1798—1846)等数十名译者参与其中,共得译稿《厚生新编》百余卷。^①

笔者发现,在这项幕府的翻译事业中存在大量的拉丁语术语。兰学作品中为何会出现拉丁语?兰学家如何获得这些术语?具体怎样学习这门语言,造诣如何,进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很有价值的问题,目前学界却鲜有论及。

二、《厚生新编》中的拉丁语及其问题

在译稿中,绝大部分词目的译名标有相应的拉丁语名。一般说来,译者通常于译名后以片假名转写荷兰语及拉丁语名。受篇幅与精力所限,本文仅以第一卷为例进行说明,具体如下表所示:

《厚生新编》卷一所载词目汉语、荷兰语、拉丁语名称对照表^②

項目	蘭名	ラテン語名
1 鷲[亦雕 Eagle]	アーデラル[Adelaar] アーレント[Arend]	アグイラ[Aquila]
2 鶺鴒[Magpie]	アークステルト [Aakster 今 Ekster]	ピカ [Pica]
3—[鸕鶿 Grebe]	アールス・フート [Aarsvoet]	キリスタテユス [Christatus]
4—[信天翁 Albatross]	アルバトロス [Albatross]	エキシユランス [Exulans]
5—[海雀 Auk]	アルク[Alk]	トルタ[Torda]
6—[森梟 Tawny owl (Strix aluco)]	アリユコ[Aluco]	
7—[蛇鵂 Snakebird]	アンヒンカ [Anhinga]	
8—[布穀鳥 Smooth-billed ani (Crotophaga ani)]	アニ[Ani]	<i>Crotophaga</i>
9(蛾蝶の一種)	アンチーケカベル [Antieke Kapel]	
10—[白兀鷲 Egyptian vulture]	アーレントギイル[Arend-gier]	ペレノプテリユス [Perenopterus]

① 关于该书的原著、底本、日译始末、稿本内容等信息,学界已多有探讨,可参阅板泽、杉本等氏の考察,板澤武雄:「厚生新編譯述考」,『史學雜誌』第43編第8號,1932年,第949—994頁;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西洋百科事典:「厚生新編」の研究」,東京:雄山閣,1998年。

② 此表基于1811年日语译稿(1937年刊本[第13—25页]与1978年影印本[第一册第12—48页])与1778年荷兰语第一册(首字母为“A”的部分)所制,为忠实反映具体对应情况,汉字及假名表记以译稿为准,并于[]内注明相应的英语、荷兰语或拉丁语名。由于部分词目中仅有荷兰语名的音译,若词目位置有译者的解说,则用○标出,如无则记以“—”,并于[]内注以汉语及英文名。部分拉丁语名见于底本,但未出现在译稿中,标以斜体。

項目	蘭名	ラテン語名
11-[Aurelia](蛾蝶一種)	アウレリヤ [Aurelia]	
12-[歐羅巴木苺 Rubus idaeus]	ア、ルベシーン[Aalbesien]	リベシウム [Ribes]
13-[草莓 Strawberry]	ア、ルド・ベシイブランド [Aardbesie-platen]	フラガリア [Fragaria]
14 葱[Onion]	アユイン[Ajuin]、シイベル[Ziepel]	セパ [Cepa]
15 番薯[馬鈴薯 Potato]	ア、ルド・アップレン[Aardappelen] タルトウヘルス [Tartouffels] ア、ルド・フリユクト [Aard vrucht]	ソラーニウム・デユペロシウム・エスキユレントウム [Solanum tubersumesxulentum]
16-?	ア、ルド・アルテキスコッケン [Aardartischokken] ア、ルド・アルテキスコッケン・オンドル・デア、ルド [Artischokkenonder de Aarde] ア、ルド・ペーレン[Aardpeeren]	<i>Helenium Indicumtuberosum</i>
17-[玫紅山鰲豆 Lathyrus tuberosus]	ア、ルド・アッケルス[Aardakkers] ア、ルドモイセン[Aardmuizen] モイセンメツステールテン [Muizen met steerten]	ラテキリユス・ベシユンキユリス・ミユリチフロリス [Lathijrus perdunculis multifloris] インテルノジユス・ニユジス [Internodiis nudis] ホリオリス・オハリブス [Foliolisovalibus] ラテキリユス・チュペロシユス [Lathijrustuberosus] カマーハクニユスルラ[?] ガランス・ラルラ[?Graslathyrus]
18 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	ア、ルド・アツゲルス[Aardangel]	デリビユリユス・デル・レステイリス [Tribulus terrestris]
19-[油莎草 Cyperusesculentus]	ア、ルド・アマンデレン [Aardamandelen]	<i>Cijperus</i>
20 楊梅[亦草莓樹]	ア、ルドベレイボーム [Aardbesieboom]	アルピユテユス [Arbutus]
21 落葉松耳[傘菌、蘑菇 Agaric]	ロルケンズワム [Lorken-swam]	アガリコス[Agaricus]

在以上 21 项词条中,共有 14 项标有拉丁语名,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作为一部译自荷兰的作品,如此高比例的拉丁语究竟从何而来?

查阅 1778 年的荷兰语本,不难发现原文大多数词条中均标有“拉丁语名……”(“in't Latijn. . .”)或词目即拉丁语(如“落叶松耳”原文即“Agaricus”,1778 I: 49)。进一步核对亦不难发现,底稿虽载但未有的情况(斜体所示);而部分拉丁语译名,如第 17 条中的后三项并不见于底本,如译者所交代的那样,“又一书有……之名”(1937: 23, 1978 I: 44)。显然,译者对拉丁语的转写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原文的忠实,而是有所取舍并参考其他著述,至于取舍的原因、标准以及参考书目等细节,目前尚缺乏确切的说明史料,姑待日后再考。

转写出所译词目的相应拉丁语名并非难事,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有无相应的拉丁语学习作为基础?

三、兰学家的拉丁语认知

要知道译者为何涉及拉丁语,必须了解他们对这门语言的认识。在具有导言性质的“译编初稿大意”(1811)中,贞由与玄泽有明确论述:

编中每条之名物,间记其罗甸名。罗甸者,通欧罗巴大洲(阿兰陀、拂郎察等一世界之总名也)总州古来之言语,诸国言辞之本源也。故诸国其辞类虽各异,名物称谓等以罗甸名通称者多矣。表曰本邦呼何某,罗甸旧称某何。近譬之本邦,如曰汉名和名也。(1937: 11, 1978 I: 11)^①

所谓“罗甸名”,即拉丁语名称。^② 兰学作品中之所以标记拉丁语名,主要是鉴于拉丁语作为欧洲通用语言的重要地位。译者发现,虽然欧洲各国语言对事物的称呼并不相同,但多以拉丁语名为通名。至于所言“诸国言辞之本源”,虽不十分严谨,却也意识到了诸多术语源自拉丁语的事实,并以汉日名称的关系来解释拉丁语与欧洲各国语言的关系。正是意识到拉丁语的本源性与通用性,翻译之际才特别重视并转写出相应的拉丁语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拉丁语的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在两位译者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兰学家笔下亦能看到拉丁语的存在。在贞由作品《硝子制造法集说》(1810)中有如下文字:

瓦拉斯,罗甸语呼云微的尔模[vitrum]。(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卷下)

^① 原文为日语,引文为笔者自译。以下行文中的史料,如引文标点为句读,则原文即汉文;如为现代标点的简体书写,均为笔者所译,译文尽量保留原文的词句特点。引用之际,随文标注出处。

^② 在历史上,中日两国的拉丁语音译表记有很多,中国有“拉丁”“辣丁”等,日本多使用假名标记(如「ラテン」、「ラテイン」、「ラチン」等)。“拉丁”等汉译曾传入日本,但“罗甸”(RANTEN)似源自日本。斋藤静:「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仙台:東北学院大学創立八十周年記念図書出版委員会,1967年,第134—135页;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方豪六十自选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35—36页。

又如,《泰西七金译说》(?1810)^①:

金,罗甸语呼云亚乌略木[aurum]。(1854,卷一,叶1a)

银,罗甸语呼云亚尔俭的模[argentum]。(同上,卷二,叶1a)

就引文来看,内容比较简单,仅仅介绍了玻璃、金、银等金属的拉丁语名,这些内容或只是对原文的直接翻译。^②令人遗憾的是,文中看到不译者对拉丁语的相关论述。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贞由对拉丁语的关注。

如果从师承来看,其师志筑忠雄(1760—1806)在翻译过程中亦曾涉及拉丁语。如在《万象新书》(1798—1802)中,忠雄曾如是言道:

是编专说求心力。求心力之语者,义翻也。罗甸“virtus centralis”,而和兰语“Middelpuntzoekendekracht”。“Middelpunt”者,中点也,心也;“zoekende”者,求之也;“kracht”者,力也,故今翻“求心力”。(1802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下编“凡例”)

译者在这里论述了“求心力”(“向心力”)的翻译问题。之所以译作求心力,是通过拆解荷兰语原词实现的:“Middelpunt”意为“中点”“心”,“zoekende”语义“求之”,“kracht”为“力”。也就是说这里的译名是从荷兰语语意直接翻译而来,然而对于拉丁语名并无讨论。

进一步追溯,这种现象可推至贞由的师爷本木良永(1735—1794)那里:

云“planeten”者,刺的印天学语也。此语通和兰“dwaalster”,此译惑星。又一名“dwaalster”,此译惑者。(1793年抄本,卷一第一章,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

这里所谓“planeten”为拉丁语天文学术语,即源自“planeta”。虽然可以由此推测拉丁语在天文学术语的重要性,但同样没有更具体的论述。而就译名“惑星”来看,亦自荷兰语译出,因为译者明确说“dwaler”(wanderer)意为“惑者”;“惑星”即拆解荷兰语“dwaalster”(ster,星)意译而成,拉丁语似无实际作用。

相对而言,另一译者玄泽的论述稍具理论性:

罗甸语者,彼邦之雅言,乃古语也。犹如和汉之有雅俗之差别。别记其详。(1788年《兰学阶梯》,“例言”,叶3b)

尽管今天尚不清楚结尾处“别记其详”的相关内容,但通过前半部分的简短文字,基本可以把握玄泽的拉丁语认知,拉丁语为荷兰之“雅言”“古语”,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汉日间“雅俗之差别”。

其实,玄泽的论述亦有其师承,在其师杉田玄白(1733—1817)笔下,已有类似论述:

然弗卵察。諳厄利亞。伊斯把价亞之三州。有互相通者呼云羅甸。猶吾邦漢朝鮮

^① 具体成书时代不详,部分研究者置于1810年,如大槻如電著、佐藤榮七增訂:『日本洋學編年史』,東京:錦正社,1965年,第349頁;亦有学者据内容的相似性认为,译文应系1811年参与《厚生新编》翻译工作之后的作品,如三枝博音編:『復刻日本科学古典全書8』(第十三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78年,第167頁。

^② 前作下卷注明底本为“縮墨爾譯說”,即Chomel的荷兰语译本,译自词条“Glas”(1778 II: 878—888);后作无具体说明,笔者通过对照阅读,初步认为其底本亦同。

等。各雖異言語其文一也。蓋和蘭為州也。凡有物必有羅甸與國語。今所直譯悉用和蘭國語也。間有羅甸而無國語者。如此之類。用羅甸譯焉。(1774年《解体新书》卷一,叶5a)

玄白认为,法国、英国、西班牙等三国以拉丁语互通,就像日本、朝鲜等国,语言虽各不相同,但均使用汉文。在荷兰,事物通常有拉丁语与荷兰语两种名称,音译(“直译”)通常以荷兰语为源,但有时会遇到无荷兰语名称的情形,则据拉丁语进行音译。

这里的论述与玄泽的认识以及“译编初稿大意”,内容大体相同,均论及该语言作为共通语的重要性,可谓一脉相承。不过,仅就《解体新书》译者群体而言,这种意见尚可追溯至其主力译者前野良泽(1723—1803)那里:

云拉丁言者,欧罗巴州中之古言雅语也。又或问国名耶哉,莫有辨者。予于辞书之中见云 Latijnland 之言者,乃国名无疑也。然其地方何处,未见言说。其后使人质于兰人,云在意大利国中。然未详其所在。(1772年《兰言随笔初稿》第十九)^①

这段简短的引文中论及两种“拉丁”,一为欧洲“古言雅语”,一为地名。对于后者,虽然通过查阅词典并询问荷兰人,确知存在位于意大利境内的拉丁地方,但是不清楚其具体位置。至于作为语言的拉丁,除了认识到其古雅之外,别处尚有更具体的认识:

云世界之四言,Hebrewus [Hebrew,希伯来]、Latijn [Latin,拉丁]、Grieks [Greek,希腊]、Hoog-Duits [High German,高地德语]是也。凡世界之言语皆由是分出。Holland 之言语亦由 Hoog-Duits 分出。吉雄之说也。(同上书,第二)

以拉丁言 Woordenboek 云 Dictionar [ium/ius]。其书有八种,所谓拉丁、英吉利、意大利、阿兰陀、希腊、葡萄牙、法兰西、马来是也。拉丁之外皆国名也。马来者,昆仑奴之所出国也。榭林氏之说也。(同上书,第三)^②

虽然并非针对拉丁语的论述,确也言明拉丁语在欧洲语言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这里明确交代了知识的来源——吉雄氏与榭林氏,前者应系为《解体新书》作序的大通词吉雄耕牛(1724—1800),后者似为同时代的另一位大通词榭林重右卫门(1720—1777)。

也就是说,兰学家对拉丁语的认识,从良泽、玄白所主导翻译《解体新书》之际就已经基本形成。而他们的这种似源自长崎通词。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拉丁语学习,又是如何影响到江户学习者的?

四、长崎拉丁语学习及其影响

1540年代以降,葡萄牙、西班牙商商人,以及西欧各国传教士相继来到日本;16世纪50

^① 大分県立先哲資料館編:「前野良沢資料集」(第二卷),大分:大分県教育委員会,2009年,第15—16頁。

^② 同上书,第10頁。

年代初,传教士开始创办各类教育机构,教授信徒日语与拉丁语,并借助这两种语言传教。^①关于日本人的拉丁语学习史,已有宫永孝结合葡萄牙语所展开的历史梳理,不复赘言。^②

但是,随着禁教令的强化、海禁政策的实施,传教士主导的拉丁语学习至17世纪40年代基本中断。此后的两百余年间,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保持商贸往来的欧洲国家,西方文化借助荷兰渠道进入日本。关于荷兰等西方典籍的输入,有学者松田清的研究可供参考,其中确可见拉丁文语法、辞书等文献资料。^③只是日方的拉丁语学习资料并不多见,或可从被兰学家奉为兰学先驱者的儒学家新井白石(1657—1725)那里窥其一斑。在地理学著述《采览异言》(1713)中,白石确曾论及拉丁语:

如其方言、有古今雅俗之辨。(諸国方言不同、而其大約有三、曰ヘイペレイウス[荷兰语 Hebreewus, 英语 Hebrew]、ラテン[Latijn, Latin]、キリイキス[Grieks, Greek]、又云ヘレツキス[? Hellas]、凡記大事、必用此等語耳[中略])文字體製、有如篆籀者。(如行草者。字体凡二、曰ラテン、曰イタアリヤ[Italia]、其ラテン如篆籀、イタアリヤ如行草、尋常者皆用草体者耳。)(1820年抄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卷一,“欧罗巴”;1881年大槻文彦校,卷一,叶2a)

后半部分为字体的论述,认为“拉丁体”(今称“罗马体”)如同篆籀,而意大利体(即Italic斜体)为行草;至于拉丁语,白石认为,欧洲的语言存在古今雅俗之不同,拉丁语与希伯来语、希腊语同为古雅的语言,用以记录重大事件。而另一部地理学作品《西洋纪闻》(1715)中,白石有进一步的说明:

拉丁者,古之国名,今其地不详。希腊亦与之同。以其拉丁,此方语音不相通者无之。诸国之人,无不学之。(1882年箕作秋坪、大槻文彦校,卷中,叶9b)^④

白石虽然不清楚拉丁之来源,却也把握到该语言在欧洲作为共通语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是以审讯西方传教士西铎蒂为契机的。西铎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 1668—1714),一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1708年10月只身潜入日本传教,不久即被发现并押解至长崎;翌年,又被转送江户接受幕府审讯。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人白石获悉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知识。

白石与西铎蒂的交流由长崎兰通词负责翻译。关于双方交流的语言,白石曾记录下这样一段插曲:

又通事等复述拉丁之语,讹则反复教之,待习得即大赞美之。闻某言之,喜曰:“通事半熟学荷兰之言,有难除之旧习。不若君也。君此前或习我方之言。”(同上,卷上,叶9a)

① 宫永孝:『日本洋学史:葡・羅・蘭・英・独・仏・露語の受容』,東京:三修社,2004年,第23—26頁。

② 同上书,第1—110頁。

③ 松田清:『洋学の書誌的な研究』,京都:臨川書店,1998年,第XXV頁。由于相关信息比较分散,这里仅标注出索引部分的页码。此外,前田氏亦有相关考察,原田裕司:『前野良沢のラテン語辞書と近世輸入ラテン語学書誌』,『日蘭学会会誌』第26卷第1号,2001年,第37—59頁。

④ 前后文内容与《采览异言》基本一致。在这两段的论述中,参考了松村明的校注本,松村明校注:『西洋紀聞』,松村明、尾藤正英、加藤周一校注:『新井白石』(日本思想大系35),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9頁。

虽然只是简单提及西铎蒂纠正通词(通事)的拉丁语发音,却也反映出审讯过程中拉丁语的使用,只是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语言尚有待考察。不过,此前的长崎审讯确借助拉丁语展开:

……以上内容,由名 Douw 之阿兰陀人,以 Latijn 之词问异人。其回答如上,我等解为和语并录之。以上。甲必丹 Jasper van Mansdale, Adriaan Douw(子)十一月
通事目付 加福喜藏 横山又次右衛門
通事 名村八左衛門 志筑孫平 今村源右衛門……(同上,“附录”,叶 2b)^①

引文中不仅出示了相关人员名单,还交代了具体的流程:先由 Adriaan Douw 用拉丁语向西铎蒂提问,然后将其回答翻成荷兰语,最后由通词等人译为日文。据甲必丹(商馆长,葡萄牙语 Capitão)Mansdale(1708—1709 在任)日记所载,当时的西铎蒂仅会一点葡萄牙语,能够通过书写日语、画图以及连比带划的日语口语回答问题,更能派上用场的则为拉丁语,而充当拉丁语翻译的是商馆人员 Adriaan Douw;在此期间,长崎方面还派人向其学习拉丁语。^②

这里涉及西铎蒂的日语学习和长崎方面的拉丁语学习两个问题。关于前者,据白石的记载,西多蒂拥有一册日语辞书(同上,下卷,叶 2ab)。从白石对辞书的称呼为拉丁语“Dictionarium”来判断,应为 1595 年刊于天草的《罗葡日对译辞书》(Ambrogio Calepino [ca. 1440—1510], *Dictionarium Latino Lusitanicum, ac Iaponicum*, 1502)或 1632 年付梓于罗马的《罗西日辞书》(*Dictionarium sive Thesauri Linguae Iaponicae Compendium*),即此前耶稣会士的作品。^③ 关于这两部作品,学界已多有探讨,无需笔者饶舌。^④ 所以,其日语学习是借助拉丁语这一媒介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耶稣会士的拉葡(西)日词典,在日流传由于受禁教、海禁等政策所限,十分有限,在海外确曾为学习者提供了门径。

至于后者,同时出现在长崎、江户审讯(同上,上卷,叶 3a)中的今村源右卫门(1671—1736)便成了问题的焦点。^⑤ 若今村氏确系 Mansdale 所言拉丁语学习者中的一员,仅一年的学习便能够胜任传译工作,确实匪夷所思。据片桐一男考证,今村氏曾受教于著名学者检夫尔。1690—1692 年间,德国人检夫尔(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以荷兰商馆医生的身份在日本逗留,并收集了大量研究资料。弱冠之年的今村氏时为检夫尔助手,正是他为检夫尔收集资料提供了极大地帮助。^⑥ 作为酬劳,于钱财之外,检夫尔还教其荷兰语、内外科医

① 《西洋纪闻》上卷(叶 14a)亦提及引文中的二荷兰人。刊本略去了“通事目付”“通事”两项的人员名单,今据松村明校注本抄出。松村明校注:《西洋纪闻》,第 95 页。

② Paul van de Velde & Rudolf Bachofner (Ed.), *The Deshima Diaries Marginalla 1700—1740*, Tokyo: The Japan-Netherlands Institute, 1992, pp. 104—108.

③ 松村明校注:《西洋纪闻》,第 479 页的补注。

④ 有島正三:「吉利支丹版羅葡日対訳辞書備考」(I & II),東京:文化書房;原田裕司:「キリシタン版『羅葡日辞書』の原典「カレビーヌス」ラテン語辞典の系譜」(私家版),2011 年;大塚光信:「解題・索引」,『羅西日辞書』,京都:臨川書店,1996 年;川口敦子:「コリヤード『羅西日辞書』諸本の異同:ローマ、ヴァチカンにおける調査を中心に」,『人文論叢』第 29 卷,2012 年,第 67—74 页。

⑤ 原文“今村源卫门英成”,“英成”当为“英生”,今村氏之名。松村明校注:《西洋纪闻》,第 11 页的頭注。

⑥ 片桐一男:「阿蘭陀通詞今村源右衛門英生:外つ国の言葉をわがものとして」,東京:丸善,1995 年,第 21—76 页。

学,以及其他西学知识。后来,检夫尔在《日本史》(*The History of Japan*, 1727)的前言中还夸赞这名助手,说他在自己的教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其荷兰语读写能力超越其他翻译人员(1727: iv)。尽管未提及拉丁语,但拥有《异域奇观》(*Amoenitatum Exoticarum*, 1712)等拉丁文著述的检夫尔无疑拥有深厚的造诣,今村氏完全有可能在当时即已从他那里获取拉丁语的相关信息。即便并非如此,这段时间的学习经验以及语言能力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西铎蒂借助拉丁语掌握了一定的日语技能,今村氏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与一定的拉丁语学习,使交流得以实现,而白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触拉丁语的。

不过,白石在询问之际亦参考了一些著述,其中包括另一名传教士冈本三右卫门“书三册”(1882年《西洋纪闻》,上卷,叶2b;中卷,叶3b)。冈本氏,原名 Giuseppe Chiara(1602—1685),亦为意大利传教士,在日本完成“锁国”后不久便冒险潜入传教。1643年被捕,后弃教并更名。尽管当时白石具体所参考的作品今已不明,但就散见于《西洋纪闻》的相关内容(「ジョセフ説」)来看,不仅有宗教知识,还涉及政治、地理等方面。^① 而从流传至今冈本氏调查资料《契利斯督记》(1650s)来看,确有对拉丁语的介绍:

拉丁之学,当总别之学

所谓拉丁之学,总名也。以拉丁之言语定其调也。南蛮人不习十二三年亦不能口诵也。南蛮之奥统帅 Imperator 七帝之国 Galacia 加拉太处,男女皆言,无他言也。若熟谙拉丁言语,则诸学习学之法易也。

所谓拉丁者,罗马之文字言语也。不学此文字,诸学无以成也。学之三年可谙也。此文字之心,同此前日本儒书中文字相反也。^②

这里介绍了拉丁语在西方学术中的重要性,大致相当于汉字汉文在日本的地位。白石关于拉丁语的认知与冈本氏有多大关联,尚难以准确回答,但从内容上看,二者大体一致。

大致说来,在江户兰学勃兴之前,拉丁语相关知识已从来日的荷兰商馆人员(如检夫尔与 Dauw)、传教士(冈本、西铎蒂)等处流向长崎通词(今村)与江户学者(白石)那里。

受禁教政策的制约,冈本氏与白石的这些作品仅以抄本的形式在知识分子之间传阅。所以,长崎渠道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亦不容小觑,如著名学者野吕元丈与前野良泽便是很好的例证。

本草学者野吕元丈(1694—1761)受命学习荷兰语,在其学习成果之一的《阿兰陀本草和解》(1741—1750)中,有一段关于拉丁语的论述:

所谓甸罗语,拉丁语也。此题文字书之书写异于阿兰陀而难读也。又或可读而义理不通也。其内关医方之事外科或可解其大概也。于横文字所通之国,任一国之学者皆通之。互通之雅言也。譬如, mirra 于唐曰木乃伊,拉丁语云 Mumia 之移也。于阿兰陀云 mensvlees,直云人肉,是俗名相传也。(1741年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抄本,“阿兰

① 松村明校注:「西洋紀聞」,第473頁の補注。

② 此段译文的原文今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820年抄本,参阅海老澤有道:「南蛮学統の研究:近代日本文化の系譜」,東京:創文社,1978年,第18、23頁。

陀禽兽虫鱼和解”)

这里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拉丁语与荷兰语的不同;其二,拉丁语具有共通语的作用,是一种互通知识的雅言。关于拉丁语及其他西学知识的来源,卷末有明确标注,即前来江户的荷兰商馆长 Jacob van der Waeijen、书记员 Jan van de Briel、外科医生 Philip Pietert Musculus,以及随行的兰通词吉雄藤三郎。

至于良泽的拉丁语知识及其来源,上文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江户以降,日本人的拉丁语学习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而展开,但随着禁教、禁海等政策的实施基本中断,但在海外确有一定影响。此后,个别传教士铤而走险,并带来相关知识,而日本学者亦在荷兰商馆人员的帮助下学习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这门语言。至于江户学者的拉丁语认知,亦存在荷兰人与兰通词所构成的长崎渠道。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者的拉丁语造诣究竟如何?

五、兰学家的拉丁语造诣

此前我们曾说过,江户兰学者主要触及拉丁语的术语音译,但并不局限于此。在展开其他方面的考察之前,我们先试着解答术语音译的意义问题。关于这一点,宇田川玄随(1756—1798)有明确论述:

每病門襲舉羅甸名。於今所譯。如贅疣然。然羅甸名是西洋雅言。名物稱謂所原據。闔洲共國所通用學者識之則當博涉荷蘭醫籍之際隨遇即解不煩質訪。譬猶羈行異域忽逢故舊中野失鄉直得斗極。大有進步之助焉。故不厭重複而示之以充馬前之車也。(1796年《内科撰要》,卷一,“凡例”,叶2b)

转写出拉丁语名,看似无用,因系西方之雅称,事物名称之本源,通行于欧洲,学者必学。所以研读兰学之际,应该仔细一一探究,将大有助于进步。出于这种考虑,故不厌其烦,转写出各疾病的拉丁语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拉丁语音译词在兰学作品中得以普遍存在。

于音译之外,确有学者较为系统地学习过拉丁语词汇,如《厚生新编》另一主力译者宇田川榕庵。在流传至今的稿本中,可以看到一册拉丁语笔记《罗甸语解》(1824)。仅从该稿本的时间来看,榕庵最晚在参与《厚生新编》翻译工作的两年前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按着字母排序的拉丁语日语词汇集,共收录700余词,不但载有名词与学术用语(如 arg. [entum] 銀、aq. [ua] plúvia. 雨水),还包括动词(如 agitans. 攪動)、形容词(facile. 容易)、副词(bene. 最能ク)、连词(et. 及,亦 nohtam.)等。^①此外,稿本载有一些荷兰语词汇(如 adynamiqúe. Krachtlooze[无能力的]),或为“理解之一助”。^②

① 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 III: 対訳語彙集および辞典の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44—948頁。

② 参阅宫永氏日语翻译,宫永孝:『日本洋学史:葡·羅·蘭·英·独·仏·露語の受容』,第36頁。

此外,榕庵别有二笔记《中西杂字簿》与《博物语汇》(年代不详),亦收录有部分拉丁语,如现代解剖学所用“解剖学”就对应“anatomica”出现在笔记中。显然,榕庵的拉丁语学习已不局限于术语音译,而是相对全面的词汇学习。这两份笔记亦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其中后者的电子版已公开,亦有杉本氏的相关研究可供参考。^①

虽然笔记中基本不涉及性、数、格等屈折变化,但从收词范围来看,榕庵的学习并不局限于专业术语,如触及动词、形容词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学习拉丁语基础词汇。他的这番努力应是解读专业性的拉丁语文献所需。

除词汇学习,部分兰学家还尝试翻译了一些拉丁语诗歌作品,如前野良泽所译《西洋画赞文稿》(1779)与志筑忠雄译著《锁国论》(1801)中的拉丁语小诗。从学习单词到解读诗句,自然是“破天荒之难事”^②,但解读能力尚需考察。

前者系良泽受将军之命,翻译佛兰德艺术家 Ioannes Stradanus(1523—1605)1580 年左右出版的铜版画集《捕猎野兽、禽鸟、鱼类》(Venationes ferarum, avium, piscium)中的捕猎歌曲,并附以解说拉丁语等概念的“余录”。接下来,我们简要考察良泽的拉丁语读解与翻译能力^③:

蓋羅甸言者拂郎察言語之所由出而古雅簡正其義最深奧也故拂郎察及和蘭等人而非學者則無知之矣況於吾崎陽乎未嘗聞有能通之者也喜平素方涉獵和蘭書動有此語則不能讀而過矣然固無能通之者則只得取和蘭所註羅甸言書時時依之考索其訓義而已(題言,71 页)

这里包含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在外语能力较强的长崎似亦无人通晓;二是借助荷兰语书籍进行学习翻译。所谓“取和兰所注释罗甸言书”,即查阅拉丁语荷兰语词典进行翻译。^④之所以提到法国,如原田氏所指出的那样,良泽将作者名后的出版商“Gall”误认为“法国”(Gallia)的缩略。^⑤

该译稿共收录六步格(hexameter)小诗九首,每首两句或四句。一般说来,良泽通常给出每首诗的“读法”“释言”“切意”,前两者顾名思义,即阅读方法与解释,“切意”即译文。不过,第二首(廿字号)因有数语未详,仅有简单的说明。此外八首中,有尾韵的三首被译成四言汉诗,有长短韵律而无尾韵的五首则译作汉文训读体,可见对原诗韵律的认识不足。

就翻译而言,与其说良泽拥有很高的拉丁语造诣,倒不如说他表现出良好的汉学修养。例如,所选第二首为描写蜜蜂的两个短句:

① 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 III:対訳語彙集および辞典の研究』,第 927—958 頁。

② 新村出:『解説』,新村出監修、吉田文治編:『海表叢書卷六』,京都:更生閣書店,1928 年,第 18 頁。

③ 图文内容有校订本可供参考,大分県立先哲資料館:『大分県先哲叢書:前野良沢資料集』(第二卷),第 66—101 頁。以下论述过程中,于正文中标记所属部分的名称及校注本页码,引文略去用于表音的日语假名表记。

④ 原田假定日本今尚保存良泽所用词典,对兰学时代输入的拉荷、荷拉词典进行调查,共得到 34 种,并指出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1725 年版 Samuel Pitiscus《新罗兰辞典》(Lexicon Latino-Belgicumnovum)的可能性最高,原田裕司:『前野良沢のラテン語辞書と近世輸入ラテン語学書誌』,第 37—59 頁。

⑤ 原田裕司:『前野良沢「西洋画賛訳文稿」のラテン語原典』,『言語文化研究』第 26 号,第 158 頁。

Mellisabesauide sic crebrffictibusaer_{is},
Ad dulcemceramatqueantrum_oenocanturodrum(廿字号,75 页)

这首诗大意是说,在空中因辛勤劳作而口渴的蜜蜂,回到了蜂蜜甜美芬芳的蜂巢中。虽然良泽识别出蜜蜂、甜美、蜜蜡(“蜡”)、洞穴(“树空”)等词,但由于不能辨识相对变化复杂的动词,只能猜测或为蜜蜂繁殖时喜爱高飞,又于树空中得到味道甘美的蜡(同上)。而第四首捕鸟诗的翻译基本准确:

IntentusmerulaAuiceps, sic retia
tenditCautusdies acnoctuCandelae
lumlue fall_{it}.

切意黄鳥于飛 弋者慕之昼則羅離 宵則灯輝 難則灯輝 實眩彼暗(廿九字号,77—78 页)

原诗说捕鸟人白天小心翼翼地布网,晚上则用灯光诱惑。^①显然,良泽对原文进行了再加工,虽然强将乌鸫鸟(merula, blackbird)译作“黄鸟”(“离”),或有误译之嫌,但对诗意的把握基本准确。从译文形式上来看,或可视为对诗经体的模仿。

而忠雄所译仅原文为两句,为检夫尔在《日本史》之附录六所引:

Hic segetes, illicveniuntfelicisUvae;
India mittitEbur, mollessuaThuraSabaei. (1727, Appendix VI: 53)

两句均出自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BC—19BC)的《农事诗》(约 39BC, *Georgica, Lib. I*, 54&58)。忠雄翻译并附说明:

此有饒禾稼 彼有美蒲萄 印度出象牙 沙巴產名香

注:右之中间所见四句原文以罗甸记之。前两句见于古诗人 Vergilius 之语。今据 Slaart 之罗甸书才得翻译大意如此。至于原文作意巧拙等事,我辈不得窥其处也。沙巴(Sabaei)在福亚腊亚国(gelukkig Arabie)。(1850 年《异人恐怖传》卷上,“锁国论”叶 3a,4b)

这里忠雄所言参考“Slaart 之罗甸书”,为平户松浦静山所藏《拉兰辞典》^②。Slaart 并非编者,为出版商名。至于译者为何仅将第一句的作者判定为维吉尔,是因为该辞典“Seges”援引该句并附荷兰语翻译,且标明语出“Virg.”;后一句中的“Sabaei”等词,辞典中虽有维吉尔的名字,但不见引文,故未能辨识。^③

只是类似作品并不多见,且存在未译、误译等问题,可见拉丁语造诣并非十分高深。整体而言,学习集中在词语层面,基本未涉及语法问题;学习之际,主要借助拉荷词典进行

① 这里及后一首均参考原田论文所引田中秀央的日语翻译,见原田裕司:「前野良沢『西洋画賛訳文稿』のラテン語原典」,第 154—157 頁。

② Benjamin Jacques & Hannot Samuel (Ed.), *Dictonarium Latino-Belgium*, 1699.

③ 原田裕司:「『鎖国論』の訳者志筑忠雄のラテン語辞書」,『言語文化研究』第 25 号,第 132—134 頁。

解读。

六、结语

江户时代以降,传教士主导的拉丁语随着政治原因而被阻断,虽有个别传教士来日,并一定程上传播了拉丁语知识,但兰学者的拉丁语学习,主要是借助荷兰渠道展开的。除荷兰书籍,尚有荷兰商馆人员与兰通词等人的社交途径。兰学者的拉丁语学习以术语为中心,对诗歌等短小作品亦有触及,拉丁语水平不算很高,但对这种语言的重要性,于学者之间,基本形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为说明拉丁文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一种共通语的特点,兰学家通常用汉文进行类比。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无疑更熟悉汉文,这种类比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在无形中也动摇了汉文的权威。通过拉丁文,日本学者隐约意识到,在陌生的西方世界,有一种足以匹敌汉语的学术共通语。在拓宽眼界的同时,亦激发了他们对语言生活的反思,为日语作为学术语言的使用积蓄力量。

作者简介:徐克伟,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教育学研究科博士生。